

中国对外贸易失衡的演变

法国国际经济研究中心 Françoise Lemoine Deniz Ünal*

引言

21 世纪初的中后期，中国在全球性经济失衡的蔓延中起着重要作用。中国主要从与美国和欧盟的贸易当中积累了巨额的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顺差。自 2007 年以来，国际贸易速度放缓，国际贸易失衡规模减小。本文分析了在全球经济危机前后中国对外贸易的演变。本文重点分析了在不同海关制度的影响下中国加工贸易与一般贸易的发展有所不同，而这种差别对于理解中国贸易失衡的波动很有帮助。

自 2007 年爆发全球经济危机以来，中国已大幅度地减少了其贸易顺差，其出口额减少，进口额则快速回升，贸易条件的恶化加速了贸易再平衡。这场危机终止了中国出口导向型增长，但它在世界市场上的影响力与日俱增。

双边贸易失衡程度仍然较大。一方面，中国与欧洲和美国的贸易顺差额几乎没有减少。另一方面，中国对亚洲、中东和非洲国家的逆差增大。中国与亚洲国家的结构性逆差源于加工贸易，中国从其邻国进口零部件用于装配和再出口。而且，亚洲国家同样显著地增加了其在中国国内市场（普通进口）的份额。中国对非洲和中东国家的逆差则源于对其能源和原材料需求的增长以及价格的上升。对于许多新兴经济体来说，出口商品到中国已经成为了头等大事。

相比之下，美国和欧洲经济体对于中国市场的依赖却仍然非常有限。尽管在中国进口商品中美国所占份额已经显著减少，但欧盟则加强了这一地位，特别是在生活消费品方面，这已成为了近几年来中国进口需求中最具活力的部分。这也反映出了中国最富裕家庭的购买力。所以，中国私人消费的发展将会对中国对外贸易平衡造成影响。在过去的十年中，投资已经成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首要动力。而中国要转变到以大众消费带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是需要大量时间的，同时也需要政府对经济和社会体制进行深远改革的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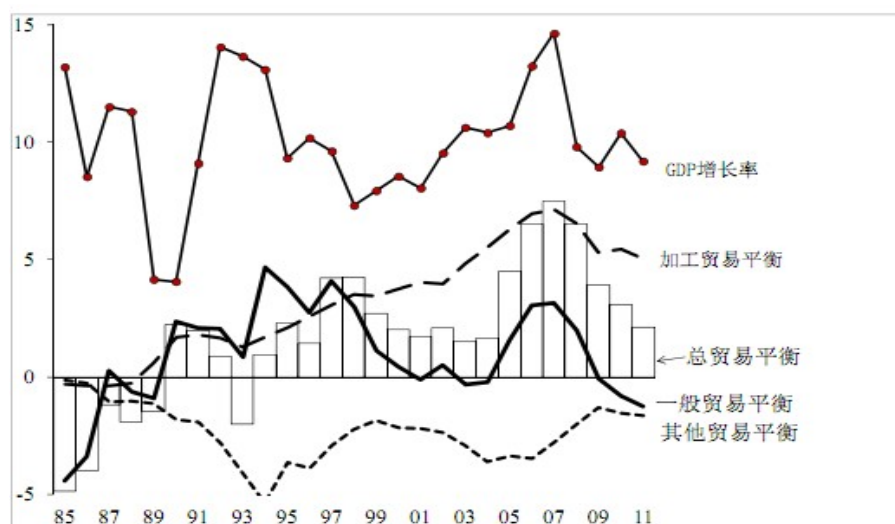
* Françoise Lemoine 和 Deniz Ünal 均为法国国际经济研究中心（CEPII）的研究员。作者电子信箱分别为 francoise.lemoine@cepii.fr 和 deniz.unal@cepii.fr。本文英文版原文为 CEPII 的工作论文，网址为 http://www.cepii.fr/PDF_PUB/wp/2012/wp2012-14.pdf。译者已经获得原作者的授权许可翻译并发表其中文版；因篇幅所限，本刊删掉了原文的某些图表。译者谭卫佳、胡倩、张小军，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国际贸易学研究生，电子邮箱分别为 tzejia@hotmail.com、peterhbue@sina.com 和 hqfighting@sina.com；校译者陈勇兵，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电子邮箱：yongbingchen@163.com。译者感谢匿名审稿人提出的宝贵意见。

本文结构如下。第一部分描述了长期以来（1981——2007）中国贸易失衡的发展过程；第二部分分析了自2007年以来对外贸易的调整情况和过程；第三部分仔细分析了中国及其贸易伙伴的贸易联系，指出哪些国家在中国的进口需求中获益；第四部分讨论了对国内居民消费再平衡的问题。

1 长期来看，中国贸易平衡问题（1985——2007）

从20世纪80年代早期到2007年，中国对外贸易的增长远远快于其国内商品贸易和世界贸易的增长。随着中国经济对外开放，对外贸易（进口额和出口额）从1981年只占GDP的15%上升到2007年占GDP的62%；中国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也从1%上升到8%。

图1：中国贸易平衡（占GDP的百分比）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和海关统计。

从长期来看中国贸易失衡问题，贸易顺差的激增是在2004年到2007年表现出来的（图1）。正如Yu（2007）、Huang和Tao（2011）和Yao（2011）这些文章中强调的，直到21世纪初的早期，中国经济的增长能够被国内改革所解释，而最近几年来更加快速的增长则主要是由出口驱动的。因此，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到21世纪中期和2004到2007年，这两个不同的时期应加以区别。

1.1 对外贸易平衡时期（1985——2003）

中国经常项目收支平衡主要是由货物贸易决定的，它占了总贸易额的五分之四。两个其他的经常项目部分是由表现出贸易逆差的服务贸易和其他表现出贸易顺差的经常收

入所组成。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到 21 世纪初期，货物贸易在贸易顺差中表现平稳，从未超过 GDP 的 4%。在这段时期，中国的国际收支顺差从没有超过 GDP 的 4%。

中国对外贸易主要由两部分组成，它们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中国贸易平衡的发展。首先，一般贸易平衡波动：逆差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 90 年代末，增长的顺差持续到 1997 年，接下来是 2001 年到 2004 年的准均衡时期。第二，加工贸易表现出顺差稳定增长的趋势。这种情况部分是由于加工活动快速扩张，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到 2004 年加工贸易占总出口额的 55% 达到顶峰；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国内加工贸易出口中本土化的程度有所增加，在 1992 年到 2004 年其占比从 20% 上升到 32%。本土比例的上升有两个原因：中国上游产业生产能力的加强（中间产品、零部件）和加工贸易活动由纺织品向电子产品的转变，这加入了更多的附加值。最后，与其他贸易体制一致的是，在这段时期之初，中国主要依赖外国公司子公司进口资本品，近段时间则转为转口贸易。

1.2 贸易顺差急剧增长时期（2004——2007）

从 2004 年到 2007 年，中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顺差额急剧增长，并在 2007 年达到最高，占 GDP 的 10%。于是，中国成为了国际贸易失衡的主导因素，根本因素则是中国对外贸易盈余由 GDP 的 2% 上升到 7% 以上。中国服务贸易外汇兑换总额表现为逆差，其他经常项目收支表现为顺差。在不断膨胀的贸易顺差背后究竟是什么原因，是国内因素还是国际环境？这已成为一个极具争议的问题。一些分析家认为，西方经济体需求激增推动了对中国商品的进口，另一些则认为中国发展产生的超额生产能力被出口到了国际市场（Anderson, 2009; Goldstein 和 Lardy, 2009）。

分析在不同的关税制度下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有助于理解外部和内部因素对其造成的影响。事实上，总体贸易顺差剧增是在加工贸易顺差显著膨胀和一般贸易由小额逆差转变为大额顺差的联合效应下发生的（图 1）。

外国企业在中国建立起了出口平台，开始了大批量的加工贸易。从 2004 年到 2007 年，加工贸易顺差剧增，占贸易顺差总增长量的近 50%。在这一时期加工出口量的扩大主要是由于加工贸易进入成本低廉，所以许多新公司进入这一出口市场（Upward et al., 2010）。他们建立起了全球化的生产基地，虽与本国经济联系甚微，但与外部对电子产品、较小范围的纺织品和服装的需求联系紧密。加工出口贸易的本土成分持续上升（从 32% 到 40%）。虽然中国加入 WTO 并未对加工贸易活动提供新的特殊鼓励政策，但这确实改善了投资环境，提升了外国投资者的信心。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中国加入 WTO 标志着中国对外贸易的转折点。正如 Yao（2011）的文章所提到的，WTO 允许中国融入了世界市场体系，并利用本国劳动力大量增长的优势发展制造业。

中国一般贸易在 2003 年和 2004 年有着较小逆差额，2004 年到 2007 年则转变为快速增长的顺差。中国民营企业是这一新趋势形成的主要原因，他们占有贸易顺差总增长额的

42% (Gaulier et al., 2011)。尽管“纺织品”部门仍然是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但是对于“机械制造”和“基本金属制造”两个重工业部门来说,中国已从一个净进口国转变为了一个净出口国。在钢铁行业中,这种转变很明显是政府政策作用的结果,政府通过各种税收和关税鼓励国内制造商,为他们提供以较低价格获得大量原材料的途径,保证他们有一定的利润空间 (Heiden, 2001)。

从会计层面上来说,外部需求和中国进口替代政策同时导致了贸易不平衡的加剧。在这段时期内,外部需求成为中国经济的发动机,为GDP的增长贡献了2到3个百分点,GDP增长此期累积达10%以上。除了会计层面外,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全部贡献就难以加以衡量了。Yao (2011)中指出,上游和下游产业链的存在使出口的实际贡献更大;但是其他学者认为,出口相关活动对于经济的实际重要性没有出口对GDP增长的影响大,因为加工贸易活动中本土成分相对较小 (Dean et al., 2008; Hummels et al., 2001; Koopman and Wang, 2008; Upward et al., 2010)。

2 自 2007 年开始出口导向型增长结束

在2008年底,全球经济进入衰退,国际贸易崩溃;两者在2009年初开始回暖,并在2011年第二季度全球贸易出口量达到了三年前的顶峰。国际需求的衰退迫使中国出口导向型增长结束。外部需求不再对GDP增长有贡献。在2008年秋,中国政府出台了一揽子措施刺激国内需求。尽管在2008年末和2009年初,GDP增长缓慢,但从2010年开始GDP增长回升(10.3%),并在2011年保持强劲增长(在9.2%以上)。

中国国际经常项目收支顺差(以美元结算)在2009年减少,并保持在低于2008年的水平。在经历了大量的调整后,从对外贸易占GDP的比例由2007年的7%下降到2010年的3%和2011年的2%。全球经济危机对对外贸易的冲击极其严重。在2009年,出口和进口价值量下降,尽管在2010和2011年有所回升,但占GDP的份额却急剧下降:出口占GDP份额从2006年的36%下降到2011年的26%,进口则从30%下降到24%。于是又回到了2003年全球经济失衡加剧前,对外贸易对中国经济有相对重要影响的状态。^①

2.1 贸易顺差快速减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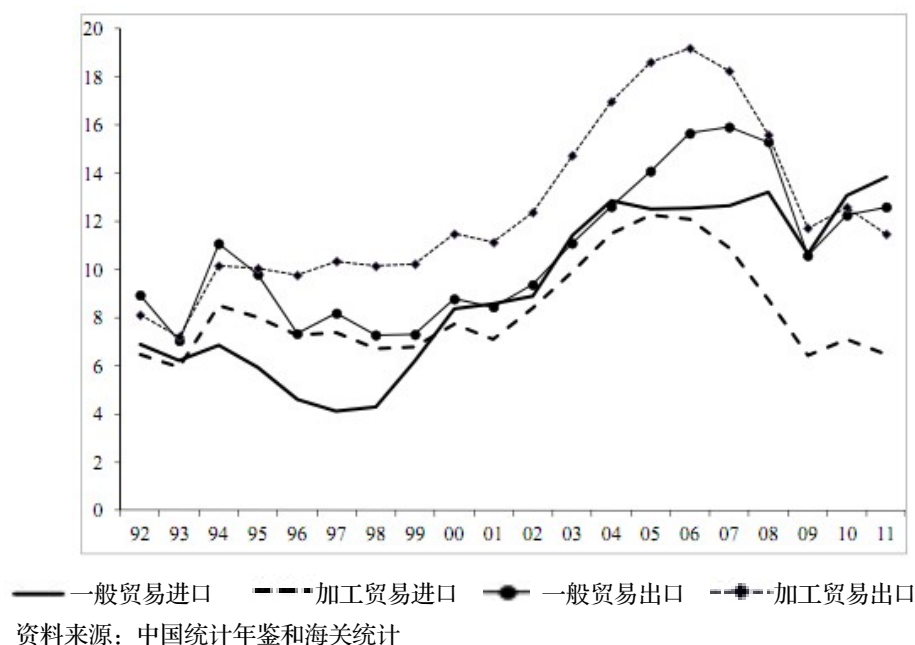
总体上,贸易顺差的减少是由于国际需求量锐减,相应的加工贸易活动放缓和一般贸易由顺差转为逆差造成的。这是与2004年到2007年中国贸易顺差剧增相对称的模式。

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出口都受到了全球经济危机的冲击(图2)。第一阶段,在2008年和2009年,加工贸易出口由于国际产品关系网而较好地抵制了经济危机,但是到2011年,一般贸易出口比加工贸易出口表现更好,因为这时一般贸易出口更多的是面对新兴市

^① 以上数据来源于原作者对中国统计年鉴和海关统计数据的统计,因篇幅原因,原图已被略去。

场 (Gaulier et al., 2011)。

图2：中国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占GDP的百分比



加工贸易进口长期受到国际需求衰退的影响。相比之下，一般贸易进口自2010年来迅速恢复。本国市场的强劲需求连同能源和一般商品成本的上升，使得2011年进口额占GDP比重升高到14%。作为经济开放的指示器，这是中国相对于以往最高的记录，并稍高于美国（13%）和日本（12%）。

中国对外贸易再平衡是由贸易条件效应促成的。2007年到2011年，中国贸易进口量增长（+40%）快于其出口增长速度（+34%），然而进口价格上升（+30%）远远快于出口价格上升（+16%）。

2.2 双边贸易失衡的弹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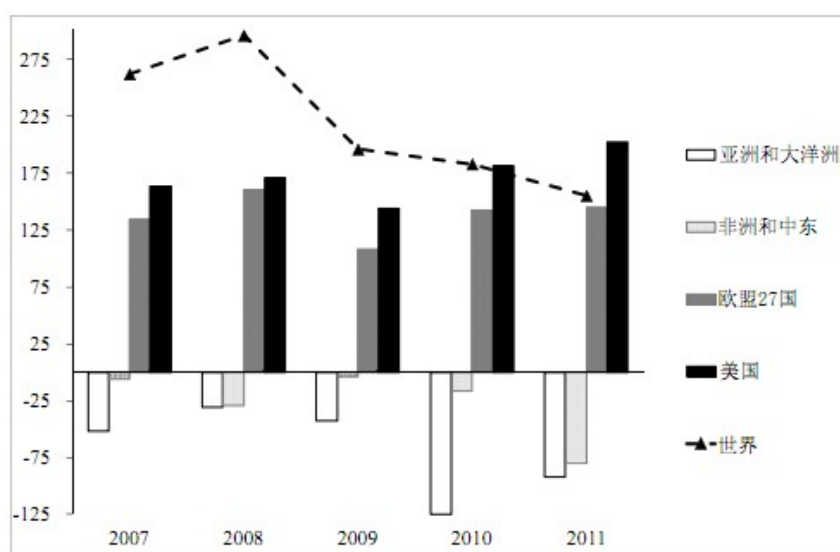
中国对外贸易顺差大幅度减少，但双边贸易失衡仍然保持较高水平（图3）。一方面，在2009年，中国减少了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又在2010年和2011年回升至2007年的水平。与欧盟的贸易顺差几乎保持平稳，尽管对德国产生了逆差，但对所有其他欧盟国家的贸易顺差却增长了。^① 另一方面，中国扩大了对亚洲国家和中东、非洲国家的贸易逆差。

中国对亚洲国家的结构性贸易逆差是由亚洲地区产业机制造成的，其中中国是一个

^① 以上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原作者进行统计后得出，原图已被略去。

从邻国进口零部件的组装国。而且，亚洲经济也很好地满足了中国国内需求（见下文第4部分）。与非洲和中东的逆差是由于中国对进口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持续增长和其价格上涨所造成的。能源和其他原材料的进口份额由2006年的26%上升到2010年的32%。^① 中国进口来源的地理变化有利于发展中的经济体。

图3：中国对主要地区的贸易平衡（单位：十亿美元）



数据来源：中国海关统计。

2.3 中国对外出口需求的依赖

自2007年以来中国经济对出口的依赖下降，但是对发达国家市场的依赖性仍旧相对较高（表1）。相对于巴西和印度，中国与三大经济体（美国、欧盟27国和日本）有着更紧密的贸易联系。尽管这种出口依赖在持续减少，但在2011年，中国出口量的44%，也即其GDP的11%，是与这些发达经济体市场直接相关的。在2012年初研究发现，欧盟和美国经济状况的恶化会对中国产生显著的负面冲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2）。2012年的第一季度，中国出口总量增长幅度明显减少（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6.9%，而在2011年第一季度为26.5%），对欧盟的出口也减少了（比同期下降1.8%），中国经济增长减缓，降至8.1%（和去年同期相比）。

此外，OECD国家对中国出口的需求不稳定可能被另一个负效应放大，即由于商品价格下降，石油和原材料的出口国的需求也不稳定（World Bank，2012）。

^① 以上数据来源于 CEPII、CHELEM-国际贸易数据库，原作者进行统计后得出，原图已被略去。

表1：对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出口（2010）

	美国	日本	欧盟27国	三大经济体
	占每个国家出口的份额			
巴西	12	4	20	36
俄罗斯	6	4	49	59
印度	12	2	19	34
中国	21	9	22	53
	占每个国家GDP的份额			
巴西	1	0	2	3
俄罗斯	2	1	13	16
印度	2	0	2	4
中国	6	2	6	14

资料来源：CEPII、CHELEM-国际贸易-GDP 数据库。

总体而言，中国在国际市场中的表现已十分突出，想要进一步提高难度较大。自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以来，中国贸易的增长快于全球贸易，而中国在国际市场上地位的提升也加剧了贸易摩擦。在2007年到2011年间，中国在世界出口总值的份额由8.8%上升至10.4%（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海关统计和WTO）。中国在制成品贸易出口方面表现尤为突出，制成品出口份额在2010年占到了全球贸易的16%，接近于主导出口国在顶峰时期的出口份额（美国1967年，德国1973年，日本1985年）。^①于是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的出口是否还存在进一步的增长空间。世界银行预测中国出口将在2030年占到国际市场20%（World Bank, 2012）。这个份额将大于以往任何主要出口国所占有的份额。

3. 贸易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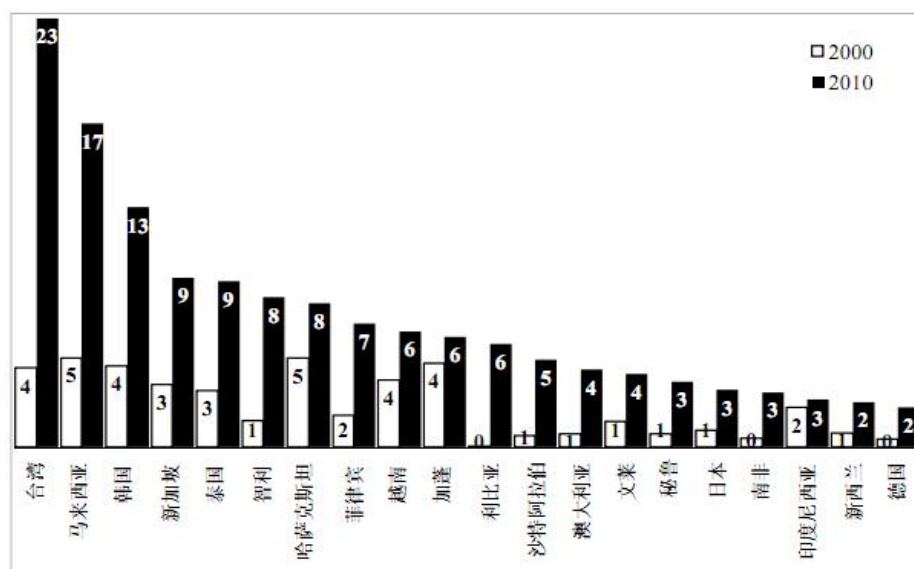
3.1 中国对贸易伙伴需求的重要性

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从2000年到2010年，中国对世界GDP增长的贡献达到20%至30%（有赖于GDP是否以现值美元计算或以购买力平价计算）。但抛开这种机械性的影响外，真正的问题在于中国是否是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增长引擎。全球经济危机加重了西方国家的担忧，他们认为中国出口活动会对西方国家本国工业和就业造成负面影响(Autor et al., 2011)。同时，中国经济反弹刺激了世界需求，发达经济体期望这种刺激作用能够帮助本国走出经济萧条。

相关研究认为，尽管中国对外需求不能完全补偿全球经济衰退效应，但主要会对亚洲经济体产生积极作用。中国对外需求积极影响着商品和能源生产国，但对发达经济体的影响则相对有限（World Bank, 2011b；IMF, 2011）。

^① 以上数据来源于 CEPII、CHELEM-国际贸易数据库，由原作者统计得出。

图4：对中国的出口额占各国GDP的比重



资料来源：CEPII、CHELEM-国际贸易-GDP 数据库。

贸易是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其他国家产生影响的主要方式。中国成为世界上需求越来越大的进口国，在2011年，中国进口量占世界总进口量的10%，而在十年前这一比例仅为3.5%。对中国出口比重越高的国家更能从中国不断膨胀的需求中获利。在图4中，各个国家按照2010年对中国出口额占本国GDP比重来排列。图7表明，许多亚洲国家和资源丰富国家的这一份额在过去十年中增长迅速，达到较高水平。

东亚国家作为一个整体，除了日本，在2010年对中国的出口占整体GDP的11%（与2000年占4%相比）。这一比例在台湾高达23%，马来西亚为17%，韩国为13%，新加坡和泰国均为10%左右。中国对亚洲国家和地区贸易的重要性明显提高。在2010年，台湾对中国出口额占其总出口额的36%（2000年这一比例为9%）；韩国的这一比例上升至28%（2000年为13%），马来西亚上升到19%（2000年为4%），菲律宾为22%（2000年为3%），日本为22%（2000年为9%）。电子产品占这些贸易流量的大部分。^①

一些中亚国家（哈萨克斯坦）、拉丁美洲国家（智利）、非洲国家（加蓬）和中东国家（利比亚、沙特阿拉伯）对中国（对中国的出口额占本国GDP的5%以上）的经济依赖性已达到较高水平。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石油进口国，并由于中国对金属的需求量已达到世界金属总需求的41%，中国对世界金属需求和价格的影响起到主导作用，而在1990年这一份额仅为5%。在2010年，智利和澳大利亚总出口额的四分之一出口到中国（而这一比重在2000年分别是6%和5%）。出口到中国的比重占哈萨克斯坦出口总额的22%，占

^① 数据来源于 CEPII-CHELEM-INT 数据库，由原作者进行统计制成图表，附于原文附录中，这里略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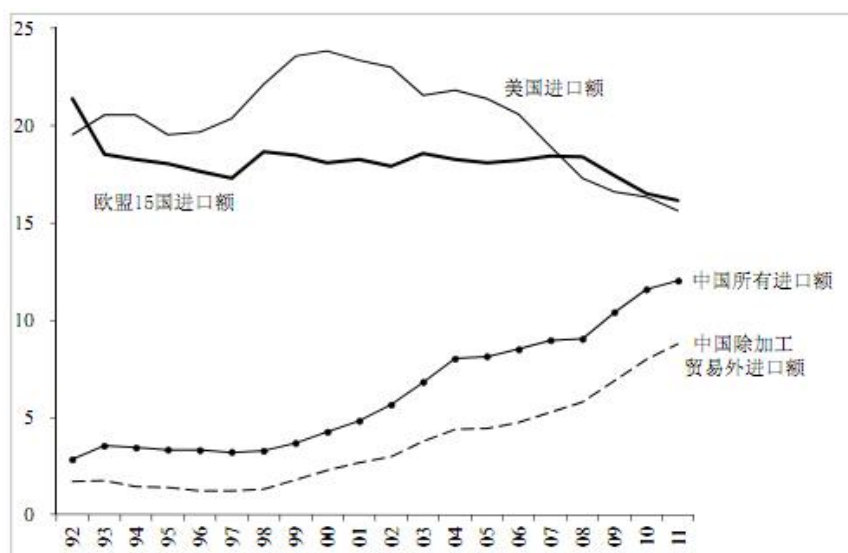
秘鲁出口总额的18%。^①

中国对制成品和原材料的进口相应地刺激了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经济增长。

相比之下，欧洲和美国对中国市场的出口额大约仅占到本国GDP的0.6%，尽管这一份额在上升，但他们对进口需求的依赖性仍然较低。欧盟国家当中，仅德国对中国出口额占到本国GDP的2%。虽然中国市场对于一些大型欧洲公司来说至关重要，但在宏观经济层面上仍是微不足道的。

3.2. 中国国内市场的进口组成

图5：主要进口国：在世界进口额所占份额（除去欧盟内部贸易，%）



资料来源：WTO 和中国海关统计，作者计算。

研究显示中国正在超过欧盟成为世界第二大进口国（World Bank, 2011b）。其实在2011年，中国已占全球进口总额的12%，而欧盟和美国的这一比例已下降到16%（图5）。然而，想要评估中国作为国际需求来源的实际重要性，更合理的方式是仅考虑一般贸易。排除加工贸易进口，中国占2010年至2011年世界进口额的9%，与欧盟和美国相比仍然差距较大，但是这一差距在2007年以来就开始减小。现在，中国对国际需求的贡献仅略小于对世界生产的贡献（占世界GDP总值的9.2%，按市场现价计算）。

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并除去2004年至2007年这段时期，中国国内市场进口量增长速度快于其整体进口量，也快于国际贸易增速。这与中国快速扩大内需和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减少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有关。考虑到中国国内进口的重要性不断提高，

^① 数据来源于 CEPII-CHELEM-INT 数据库，由原作者进行统计制成图表，附于原文附录中，这里略去。

我们应来看看中国一般进口商品的结构特征。采用全球经济危机前十年（1997—2007）的数据，我们的分析结果显示了中国进口在地理方位和行业组成上的明显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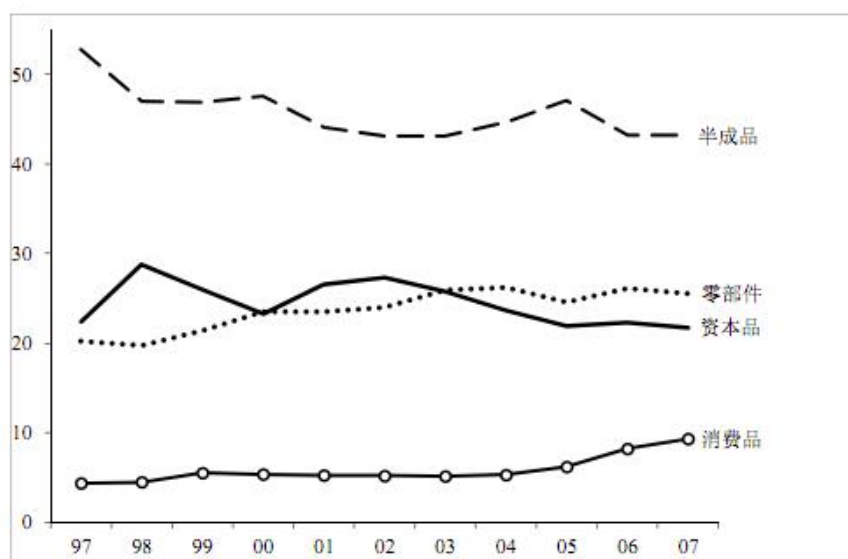
表2：中国一般货物进口地区来源（%）

	1997	2007
发达亚洲国家及地区	29	33
日本	14	12
韩国	6	7
台湾	2	4
香港	2	1
发展中亚洲国家	8	9
欧洲	20	18
德国	7	7
法国	3	2
意大利	2	1
英国	2	1
北美自由贸易区	21	11
美国	17	8
世界其它地区	23	30
全球	100	100

资料来源：Gaulier, Lemoine, and Ünal (2011)来自中国海关统计。

商品结构上最重要变化是初级产品比重增加，从总额的20%激增到40%，所以能源与原材料产出国是中国国内需求快速增长的主要获益者（见表2占世界其他国家不断增长的份额）。

图6：中国一般贸易进口中制成品的组成（%）



资料来源：Gaulier, Lemoine, and Ünal (2011)来自中国海关统计。

针对制成品的一般贸易进口，本文将产品根据它们的生产阶段分为四类：消费品、投资品、半成品和零部件（图6）。在这十年中，尽管半成品占比有所下降，但它一直是最重要的产品种类（2007年占到43%）。零部件是最具活力的进口产品（达到26%），并超过了资本品（22%）；消费品进口快速增长（从4%增长到9%），反映出中国最富裕家庭购买力持续上升的趋势。

亚洲国家（主要是韩国和台湾地区）在中国一般贸易进口中占有重要地位，1997年比重为37%到了2007年则增长到42%（表2）。亚洲国家在对中国制成品出口方面表现更加突出，从38%增长到52%（表3）。中国在对亚洲地区制成品的所有种类产品的进口上都有所提高，特别是初级产品和消费品以及资本品，它们分别占到2007年中国进口额的58%和47%。因此，在中国工业化生产的过程中，亚洲国家为中国生产能力的发展和现代化进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亚洲供应商已经赶上欧洲为中国供应国内所需资本品。

表3：中国制成品一般贸易进口情况，由原产地和生产阶段划分

	半成品	零部件	消费品	资本品	所有阶段产品
截止到 2007 年（%）					
发达亚洲国家	19.3	12.8	2.7	9.5	44.3
发展中亚洲国家	4.3	2.1	0.9	0.8	8.1
欧洲国家	6.8	8.0	3.8	8.0	26.7
北美自由贸易区	5.6	2.2	1.5	3.2	12.5
其它地区	7.3	0.4	0.5	0.2	8.4
全球	43.3	25.6	9.3	21.8	100.0
1997—2007 年间的变化（%）					
发达亚洲国家	+1.1	+5.7	+1.5	+3.8	+12.1
发展中亚洲国家	-0.5	+1.9	+0.1	+0.7	+2.2
欧洲国家	+1.3	+0.3	+2.6	-1.8	+2.3
北美自由贸易区	-4.5	-2.4	+0.7	-2.7	-8.8
其它地区	-7.0	-0.3	+0.1	-0.5	-7.8
全球	-9.6	+5.3	+5.0	-0.6	0.0

资料来源：Gaulier, Lemoine, and Ünal（2011）来自中国海关统计。

北美自由贸易区过去十年中在中国市场上的表现好坏参半。北美出口国仅在消费品方面表现不错，而在其他种类的产品上，对中国的出口较少。

欧洲成功跟上了中国的强劲需求，增加了对中国制成品一般贸易的出口（所占份额由24.4%上升到26.7%）。在中国快速增长的消费品进口需求中，欧洲供应国比亚洲供应国获益更多。这表明欧洲制造商在高端消费品生产上的优势。德国对欧洲在中国市场上的发展起到了主要作用，不仅表现在资本品也在消费品方面（Gaulier et al., 2012）。自2007年起，消费品已成为中国增速最快的进口产品种类，欧盟则持续扩大对中国市场份额。

与其他大型新兴经济体相比，如巴西和俄罗斯，他们的消费品在进口结构占有重要地位，而中国消费品在进口产品中的比重还相对较低。但是这一情况正在逐渐发生改变。根据世界银行（2011b）的数据，居民消费对于中国经济的再平衡将会对东亚国家与中国的贸易平衡产生重大积极影响。对于欧洲来说更是这样。对于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来说，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模式至关重要，因为他们可以从中国巨大的潜在国内市场中获益。

4. 什么抑制了居民消费？

过去的二十年间，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是基于低工资、资本积累和强劲的价格竞争力建立的。全球经济危机突显出了这种增长模式对于外部冲击的弱点。早在经济危机发生之前，人们便认识到这种增长模式过于依赖出口、投资和工业制造，在长期来看是不可持续的（Yu，2007）。中国十一五规划（2006—2010）已经强调了这种不平衡增长的风险，并提倡集中发展服务业，拉动国内需求和居民消费。然而，这并没有扭转趋势，经济不平衡愈演愈烈。伴随全球经济危机的到来，刺激计划成功地拉动了国内需求，但是居民消费仍然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而投资相对而言则更活跃一些。十二五规划（2011—2015）再一次设定目标，即通过完善福利系统，提高最低收入，改善公共服务来提高居民生活水平。

4.1. 人口和制度因素

21世纪初期以来，中国的消费远远落后于经济增长，消费占GDP份额在持续地大幅下降。消费从2000年占GDP62%下降到2007年的49%，又下降到2010年47%。私人消费占GDP的份额则从46%（2000年），下降到36%（2007年），又降到34%（2010年），是历史最低点。^①极具争议的是为何中国居民消费会下降到如此低的水平（CEQ，2009；Lardy，2012）。有人口的原因，也有制度的因素。其论据可以概括如下。

第一，居民收入没有其他种类的收入增长快。21世纪，居民收入占GDP比重下降了10个百分点。这种下降主要与工资有关。1980年到2010年间，工龄人口大量增加，有大量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工业部门。这两种变化，使得劳动力趋近无限供应，并对工资造成压力（Yao，2011）。制度环境因素也挤压了工资。在工业化时期，介于资本劳动比率的增加，政府期望通过利用资本量来改变收入分配状况。此外，中国已经实现了部分市场自由化，并造成了成本扭曲。生产要素价格被人为地保持在低水平；劳动力工资支付不足（工资增加水平远低于生产率提高水平）；资本廉价，这导致了对投资的偏向和消费信心的下降（Huang和 Tao，2010）。

其他制度因素也已开始发生作用。社会转移支付（养老金、福利补贴）落后于经济

^① 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由原作者进行统计制成图表，附于原文附录中，这里略去。

增长，银行存款的利率上限使得收入中储蓄的部分减少（Ma和Yi 2010；Lardy；2012）。

第二，中国家庭储蓄率提高，达到了极高的水平（2009年为30%，而20世纪90年代中期仅为19%）。同样，这能用人口因素解释，如人口负担系数下降；但也受制度条件影响：缺乏安全保障使得居民增加预防性储蓄，收入分配不平等使得高收入家庭储蓄更多。外来务工人员几乎占到产业工人的一半，但却没有融入当地城市中，他们有着相当高的储蓄率。低利率使得居民增加预防性储蓄，并鼓励人们购置房产，从而导致房价上涨。

国内经济不平衡被合理地测算过吗？

近来人们提出了另一种假设，由于居民支出和收入的数据存在严重缺陷，国民核算没能提供准确测算国内经济不平衡的方法（CEQ，2009；Lardy，2012）。核算方式的改变只能解释为什么劳动收入占GDP比重缩小了一半。其他原因认为是居民的实际收入被少报了：官方统计并不包括灰色收入（土地交易、礼品、贪污、垄断利润），也不包括其他未申报收入（变卖财产、租金和资本收益）。一些文章认为，居民的实际收入可能比官方数据记录高60%（Wang和Woo，2011）。消费支出也被少报，因为实际服务成本（特别是医疗、教育）远远高于官方公布数据。此外，人们的住房花费水平也被低估了，因为数据不包括拥有自己住房居民的估算租金，这在国际会计惯例上是一样的情况。

相应地，官方数据高估了投资。例如，对固定资产投资的数据包括企业并购和土地交易价值，但这些并不代表资本的增加（仅是所有权的转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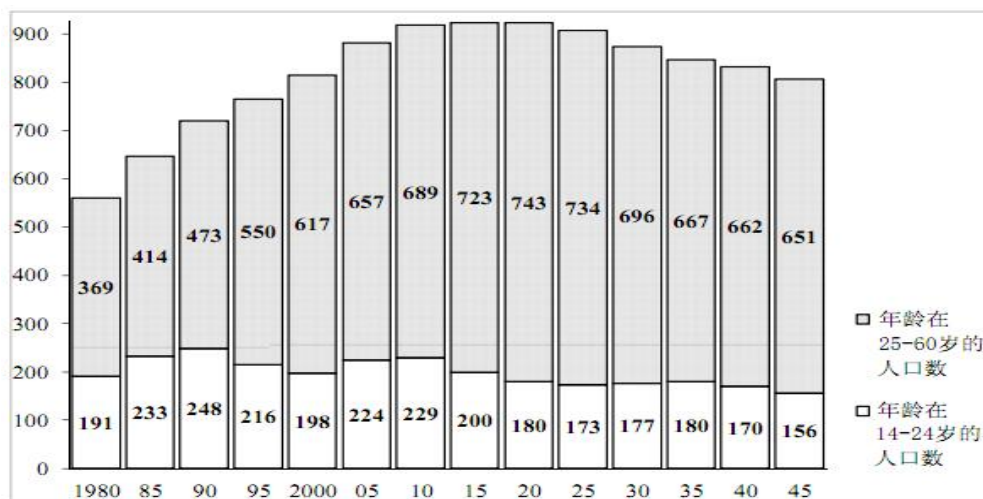
因此，国内经济失衡也许并没有看起来那么严重。考虑到数据的缺失，我们很难判断最近支持私人消费的调整措施是否发生了作用。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研究，经济不平衡已停止加剧，2011年已经开始了再平衡（OECD，2012）。然而，我们依然不确定中国多快能开始一个新的经济发展模式。

4.2. 中国多快能改变经济增长模式？

确实，中国的人口结构正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工龄人口（15—64岁）增长停滞，并将从2015年开始减少。年轻工龄人口已经开始减少了（图7）。此时劳动力储备便不再是无限的（刘易斯拐点）。然而，在中国是否已达到人口转折点这一问题上还没有一致的结论。有文章认为这一拐点几年前就已经达到了，现在的劳动力短缺现象已抬高了工资和附加福利（Cai，2012）。实际上，不具专业资格的劳动者的工资水平（大多针对外来务工人员），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几乎停滞不前，在2004年以后开始上涨，这一上涨趋势被金融危机打断过，但此后又有所恢复了。

然而，其他经济学家认为中国还没有耗尽劳动力储备，因为农村仍有很多潜在移居者（8000万）。从这方面来看，出口导向型增长还会再持续15—20年（Yao，2011）。近来工资的增长仅仅是由于沿海省份当地劳动力短缺，于是更多地依赖于内陆省份的务工人员，而并没有反映出宏观经济的状况。内陆省份经济增长强劲使得外出打工者有所减少。

图7：中国：工龄人口趋势，1980—2045（百万）



资料来源：美国WDI数据库。

2009年由于经济危机，最低工资水平并没有提高，2010年和2011年，中国当局提高了这一水平。尽管没有证据直接显示劳动力成本增长快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并危及到中国工业的竞争力，不同领域仍然存在一些迹象。一些在劳动密集型领域的企业搬到国外进而减少生产成本，其他企业搬到内陆省份，另一些企业则投资资本设备以提高生产力，以此保持他们的竞争力（Lardy, 2012; SCB, 2012）。所以，仅仅是人口变化并不足以推动一个新的经济增长模式。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居民收入下降的压力不仅来自于人口因素，还与制度因素有关。向新的增长模式转变必须有国内提高居民购买力政策的支持。改革依赖于经济和社会政策的实施（Yu, 2010; World Bank, 2011a; World Bank和DRC, 2012）。城市化会增加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前提是新的城市工人能享受到社会保障和城市社会服务。迄今为止，城市化进程仍“未完成”，因为三分之一的城市居民在城市消费经济之外（CEQ, 2011）。如果中产阶级的增加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那么城市化需要更具包容性。

实际上，政府正在计划扩大对外来务工人员 and 农村人口社会保障（养老金、医疗）。尽管中国已经加快进程，但介于中国社会支出与其他大型中等收入国家相比相对较低，例如巴西和土耳其，所以仍旧存在提升空间（World Bank和DRC, 2012）。

一般而言，许多人认为为了达到长期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中国必须发起新一轮广泛而影响深远的改革，包括金融领域自由化，国有企业改革（有助于减少企业储蓄）。因为长期低迷的国际需求将亟需中国国内的消费刺激，所以中国经济改革可能会迫于国际环境的压力而加速进行。

结论

自2007年以来，中国已大幅度减少国际贸易顺差。这种外部再平衡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贸易环境恶化造成的。原材料和能源出口国则从中国强劲的需求中获益。亚洲国家和欧洲（主要是德国）同样也从中国对制成品的需求中分得一杯羹。然而，中国对美国 and 大部分欧盟国家的双边贸易顺差仍旧很大。此外，中国占有的世界市场份额持续扩大，这是与许多贸易伙伴关系紧张的原因之一。

自2007年以来，国内需求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占主导地位的是投资而不是居民消费。根据现有数据，截止到2010年，私人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小于投资。中国为了保持经济可持续增长，需要转变为大众消费驱动经济增长的经济模式，这将需要对经济和社会政策进行深远的变革。

在2012年，中国国内需求减少。房地产泡沫的降温导致投资和投资相关产业增长放缓。从外部方面来看，全球需求疲软，特别是欧洲，严重地打击了中国出口行业。为了保持政府设定的经济增长目标（7.5%），政府当局采取刺激措施。中国在保证提高国内需求的同时又要避免房地产投机的恢复，这是极具挑战性的。中国扩张性财政政策包括对中小企业和居民减免税，增加对教育、卫生保健、养老金和社会性住房的投入。在2008年底中国就依靠银行贷款的投资项目实施了一系列刺激措施，此次新一轮刺激措施将为消费和公共支出带来更大的增长空间。

参考文献：

- Amiti, M., Freund, C., 2010, The anatomy of China's export growth, in *Chin's Growing Role in World Trade*,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 Anderson, J., 2009, The myth of Chinese savings,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172, 24–30.
- Autor, D., Dorn, D., Hanson, G., 2011, The China syndrome: Local labour market effects of import competi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MIT Working Paper.
- Cai, F., 2012, The coming demographic impact on China's growth: The age factor in the Middle-Income trap, *Asian Economic Papers* 11.
- Chen, B., Yao Y., 2011, The cursed virtue: Government infrastructural investment and household consumption in Chinese provinces, *Oxford Bulletin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73, 856 – 877.
- CEQ (China Economic Quarterly), 2009, *Rebalancing Growth* 13.
- CEQ (China Economic Quarterly), 2011, *Urban China Congested, Ugly and Gray* 15 .
- Dean, J., Fung, K., Wang Z., 2008, How vertically specialized is Chinese trade? USITC Working Paper.
- Eichengreen, B., 2011, *The G20 and global imbalances*, The German Marshall Fund of the United States.
- Gaulier, G., Lemoine, F., Ünal, D., 2011, China's foreign trade in the perspective of a more balanced economic growth, CEPII Working Paper.
- Gaulier, G., Lemoine, F., Ünal, D., 2012, The rise of emerging economies in the EU15 trade,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9.

- Goldstein, M., Lardy, N., 2009, *The Future of China's Exchange Rate Policy —Policy Analyses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87,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 Heiden, P. in der, 2011, Chinese Sectoral industrial policy shaping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vestment patterns—Evidence from the iron and steel industry, Duisburg Working paper on East Asian Studies, No.88.
- Huang, Y., Tao K., 2010, Factor market distortion and the current account surplus in China, *Asian Economic Papers* 9, 1–36.
- Huang, Y., 2011, Misinterpreting China's economy,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25.
- Hummels, D., Ishii, J., Yi K., 2001, The nature and growth of vertical specialization in world trad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54, 75–96.
-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2012, *China economic outlook*, 6 February.
-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2011,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MF Country Report 11/192, July.
- Koopman, R., Wang, Z., Wei, S., 2008, How much of Chinese exports is really made in China? Assessing domestic value-added when processing trade is pervasive, NBER Working Paper.
- Lardy, N., 2012, *Sustaining China's Economic growth After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 Ma, G., Yi, W., 2010, China's high saving rate: myth and reality, BIS Working Paper 312.
- OECD, 2012, *China in Focus: Lessons and Challenges*. OECD, Paris.
- Poncet, S., Jarreau, J., 2012, Export sophistication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Chinese province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97, 281–292.
- Rodrik, D., 2006, What's so special about China's exports? *China & World Economy* 14, 1–19.
- SCB(Standard Chartered Bank), 2012, China: More than 200 clients talk wages in the PRD, *Global Research, On the Ground*, 5 March.
- Upward, R., Wang, Z., Zheng, J., 2010, Weighing China's export basket: An account of the Chinese export boom, 2000–2007,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Research Paper Series –China and the World Economy, Research Paper 2010/14.
- Wang, X., Woo, W., 2011, The size and distribution of hidden household income in China, *Asian Economic Papers* 10, 1–26.
- World Bank, 2012, Uncertainties and vulnerabilities, *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 4, January.
- World Bank, 2011a, Securing the present, shaping the future, *East Asia and Pacific Economic Update* 2011–1.
- World Bank, 2011b, Navigating turbulence, sustaining growth, *East Asia and Pacific Economic Update* 2011–2.
- World Bank, DRC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of the State Council,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12, *China 2030: Building a Modern, Harmonious, and Creative High-Income Society*, Conference Edition, Washington.
- Yao, Y., 201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s export-led growth and its double transition of demographic change and industrialization, *Asian Economic Papers* 10, 52–76.
- Yu, Y., 2007, Global imbalances and China, *Australian Economic Review* 40, 3 – 23.
- Yu, Y., 2010, A different road forward, *The China Daily*, 23 December.